

東亞文明研究叢書 81

東亞知識人 對近代性的思考

Modernity

徐興慶◎編

東亞文明研究叢書 81

東亞知識人 對近代性的思考

Modernity

徐興慶◎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東亞知識人對近代性的思考 / 徐興慶編.
--初版--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民98〕
464面：15*21公分。(東亞文明研究叢書；81)
含名詞索引及人名索引
ISBN: 978-986-01-7735-0 (精裝)

1. 學術思想 2. 知識份子 3. 文集 4. 東亞

113.07

98002957

統一編號 1009800383

東亞文明研究叢書 81

東亞知識人對近代性的思考

編者：徐興慶

策劃者：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

「東亞經典與文化」研究計畫 (<http://www.eastasia.ntu.edu.tw>)

出版者：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發行人：李嗣澐

發行所：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http://www.press.ntu.edu.tw>)

法律顧問：賴文智律師

展售處：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10617 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1號

電話：02-23659286 傳真：02-23636905

E-mail：ntuprs@ntu.edu.tw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電話：(02) 2518-0207

國家網路書店 <http://www.govbooks.com.tw>

五南文化廣場 電話：(04) 2226-0330

責任編輯：姚丞倫

封面設計：陳柏蓉 (muse0616@hotmail.com)

出版時間：2009年8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450元整

GPN: 1009800383

ISBN: 978-986-01-7735-0 (精裝)

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

序

黃俊傑*

臺大日文系徐興慶教授最近兩年參與臺大「東亞經典與文化研究計畫」第一階段（2006年8月至2008年7月）期間，為了研究東亞文化交流史的需要，而廣泛閱讀當代學者的相關論著，他在徵得作者同意之後，編輯七篇論文成為一書，定名為《東亞知識人對近代性的思考》。徐教授將他編輯的這部書稿交我閱讀，並希望我寫一些文字，向讀者說明。

這部書所編輯的七篇論文，大抵可以歸納為三個範疇：一、近代以前東亞知識人的世界觀；二、東亞知識人對近（現）代性的思考；三、傳統與現代知識人互動的問題。本書七篇論文在不同程度之內與不同議題上，都觸及以上三個範疇。但這三個範疇的各種問題，都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1942年9月與10月《文學界》雜誌連刊的「近代的超克」學術討論會記錄中提出的「近代的超克」這個問題意識，有其直接或間接的關係。

正如竹內好在1959年11月所說，「『近代的超克』作為事件已經成為過去。但是，作為思想還沒有成為歷史」，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特聘教授、「東亞經典與文化研究計畫」總主持人。

近代中國與日本的知識人在思考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化問題，以及建構他們的世界觀的過程中，西洋文明一直是他們的思想世界中「未經明言的他者」，也是「不可避免的他者」。近代中日許多思想家在不同程度之內，都以西洋文明為參照系統，許多人均以「超克」西洋之近代化的模式作為目標。

徐興慶教授編輯這七篇論文的具體內容及其貢獻，他在「導論」會有詳細的介紹，但就這七篇論文所探討的中日近代知識人對近代性的思考來看，似乎仍是沿著所謂「近代的超克」這條思想軸線而發展。這部書的編輯與出版，也許有助於我們在 21 世紀重新考量「近代的超克」這個具有亞洲特色的問題。

2008 年 11 月 22 日
於臺北

導 論

徐興慶*

「近代性」(Modernity)，是指十六世紀以降自傳統農業社會轉變為西洋近代工業社會過程中各種社會現象的變化，亦即西洋文明的近代性，被視為對東亞傳統文化造成影響、並引起騷動的現象。這種現象促使東亞知識分子強烈意識到東西方文化的迥異。至十九世紀為止，中日韓三國都存在著傳統的儒家文化要素，對東亞文明的發展也都扮演過重要的角色，但西洋文明進入東亞世界之後，中日韓的傳統文化都面臨不得不轉型的命運。因為各國所面臨的政治環境、地理條件及社會發展的情況都有所不同，各國的知識人在面對國民國家有可能被解體的命運、傳統文化與近現代文明如何取捨的問題時，都有異於政治人物的嗅覺與感觸，中國、韓國及日本對「近代性」的理解、應用及發展，各有不同的方式及特徵，臺灣自然也不例外。

高坂史朗認為，日本的歷史在以近代化為目標的前提下發展，但是以「西洋近代」為測量標準的「近代化」來衡量其他亞洲國家時，就呈現出「日本成功地樹立了東洋最初的近代國家」(丸山真男)這樣的「近代化一元論」。

* 國立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授、日本關西大學 CSAC 客座研究員。

那是沒有看到亞洲國家在近代化中各種面向不同的糾葛，是毫無意義的。¹他的《近代という躰き》一書即為了跳脫這樣的思維模式，試圖探索東亞各不相同，甚至於矛盾的近代化之苦惱。

曾經批判日本神話，論證《古事記》與《日本書紀》史實的基礎，指出神代天皇的故事並非建立在客觀的事實上的歷史學者津田左右吉(1873-1961)，²因二次大戰失敗，而改變了日本對皇國史觀的價值判斷，但津田在《中國思想與日本》(1937)中表示，「由於漢字涵蓋著中國思想，應廢止漢文課程，盡可能不使用中國文字」，主張漢學、漢字無用論。津田主張的日本的「近代性」是將中國排除在外，因為「日本並非接受中國影響之東亞的一部分，而是接受歐美文化眾多影響之世界的一部分」(294頁)；認為日本與中國並非同時存在於「東洋」，兩國無論在文化、價值觀或生活形態上皆未有共通處，因此反對將中國思想用於日本，試圖建構日本邁向世界的道路。對於這些觀點，最近石之瑜於其《日本近代性與中國：在世界現身的主體策略》一書中指出，津田以日本為自我中心而忽視中國的思

¹ 高坂史朗，〈比較という視野〉(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演講稿，2008.12.12)。高坂史朗，《近代という躰き》(京都：ナカニシヤ出版，1997)。

² 津田左右吉，《神代史の新研究》(東京：二松堂，1913)；『古事記』と『日本書紀』の新研究(東京：洛陽堂，1919)；《神代史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24)。

維，其論述的中國並非具有普遍性及客觀性的中國，是為「日本的中國」，而贊同溝口雄三的評論。³石之瑜更進一步述及，津田若是為了日本而將中國排除，則日本即非一具有世界性、普遍性、科學性及客觀性的國家。⁴

溝口雄三自 1980 年代起，即反對基於西洋（主要指歐洲）以往的歷史演變及其價值觀，亦即以所謂「歐洲一元論」的思維模式，作為世界史或人類之普遍原則；而主張應持有多元的世界觀。⁵換言之，溝口以「方法としての中国」之論點檢視中國的近代性，將日本、中國與歐洲相對化，在相對化的多元理論之上創造出更高次元的世界。就相對主義的觀點而言，「自始中國的近代即未超越歐洲，亦未遭到遺棄或落後。中國一開始即踏上異於歐洲、異於日本的獨特歷史道路，至今依然如此」。溝口詳細檢視了明末清初至清末的中國思想家所經歷的思想變遷，作為其論點的佐證，並提出東亞各民族錯誤評價本國的傳統而導入西洋文明的作法並不可行之觀點，深獲多數中日學者的贊同。

關於日本的近代性，評論家竹內好（1910-1977）採用「否定自我」之研究方向，提出下列批判：

³ 溝口雄三，《方法としての中国》（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9）；林右崇譯，《做為「方法」的中國》（臺北：國立編譯館，1999），頁 113。

⁴ 石之瑜，《日本近代性與中國：在世界現身的主體策略》（臺北：國立編譯館，2008），頁 208。

⁵ 溝口雄三著，索介然、龔穎譯，《中國前近代思想的演變》（北京：中華書局，2005），〈致中國讀者的序〉。

近代的日本，僅為徹底的歐美優等生。過去以中國的經典發展漢學，因其後的開國接受了歐美，由於欲憑藉歐美而邁向現代，因而喪失了「自我」。⁶

竹內好並指出，以歐美為學習目標的日本，是失去「黨派性」⁷的文化，僅是擁有對於他者存在著高度依賴性質的國家而已。

Robert Bellah 於《德川宗教：現代日本的文化淵源》（*Tokugawa Religion: The Cultural Roots of Modern Japan*）中，⁸探討德川時代文化根源的宗教理論，作為印證日本現代化成功的論述。而 Andrew Gordon 於《二十世紀日本：從德川時代到現代》（*A Modern History of Japan: From Tokugawa Times to the Present*）中，也描述「近代性」為日本帶來的希望與悲痛、日本社會的不安，以及日本人生活的多樣性，並論述日本與世界的連結，和自德川時代起日

⁶ 石之瑜，《日本近代性與中國》，頁 202。

⁷ 在此所謂的「黨派性」，是指於充滿矛盾的混沌狀態中尋求自我的確立，於重複「否定自我」的環境中，選擇了「自己」，透過如此的自我確立而改造世界。孫歌，《竹內好的悖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 42。

⁸ Robert Bellah, *Tokugawa Religion: The Cultural Roots of Modern Japan* (New York: Free Press; London: Collier Macmillan Publishers, 初版 1957; 再版 1985), 日文譯本為堀一郎、池田昭譯，《日本近代化と宗教倫理：日本近世宗教論》（東京：未來社，1978）；中文譯本為王曉山、戴茸譯：《德川宗教：現代日本的文化淵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

本社會變化的樣貌。⁹這些美國學者觀看日本「近代性」的論點，均強調必須回溯時代，審視日本民族、文化要素的形成，進而客觀論述東方傳統及西方文明之多重性、關聯性究竟為何。

自 1970 年代至今，有不少著作論及「近代思維之挫折」、「東西文明之衝突」等概念。¹⁰亦即，以東亞諸國學習西洋先進技術、同時抵抗列強的武裝侵略之現象，作為觀察近代東西雙方關係發展的主要手法，並將其過程視為東亞諸國邁向近代化之道路。然而，對於西洋文明進入東亞的複雜現象，各國的反應截然不同。諸如：中國由「中體西用」轉變為「西體西用」、日本自「和魂漢才」改變為「和魂洋才」、韓國則針對「東道西器」，廣泛地展開各種論爭。換言之，各國對於近代性的對應方式，雖具有「富國強兵」的一致性，同時也必須考量各民族文化背景的差異。近年來，於東方傳統與西洋文明的糾葛中探究「挫折」、「衝突」的同時，也出現了呼籲重新思考全球化的必要性、以謀求

⁹ Andrew Gordon, *A Modern History of Japan: From Tokugawa Times to the Present*. 森谷文昭譯，《日本の 200 年：徳川時代から現代まで（上、下）》（東京：みすず書房，2006）；李朝津譯，《二十世紀日本：從徳川時代到現代》（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6）。

¹⁰ 島田虔次，《中国における近代思维の挫折》（東京：筑摩書房，1970）；甘方萍譯，《中國近代思维的挫折》（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高增傑，《東亞文明撞擊：日本文化的歷史與特徵》（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2001）。高坂史朗著，吳光輝譯，《近代之挫折：東亞社會與西方文明的碰撞》（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

東西文化融合之視野，而改變研究方向的論點。¹¹強調儒家文化的保存價值，同時思考西洋文明如何涵融於中日韓的文化脈絡中。亦即在對照東方傳統及超越近代的同時，由模仿中萃取出邁向獨立的文化要素。

筆者最近一直關心東亞的傳統與近現代之問題，從涉及高杉晉作（1839-1867）與中國的關係，¹²中法戰爭前即對晚清保守派或洋務派嚴厲指責的知識人王韜（1828-1897）與日本的關係，¹³延伸到日本對「漢學」與「蘭學」的發展，分析德川幕末箕作阮甫（1799-1863）、塩谷宕陰（1806-1867）、佐久間象山（1811-1864）等知識人的思想形成。加上閱讀葛兆光提及「在十七世紀以後的三百多年中，由於歷史的變遷，在文化上，東亞三國實際上已經分道揚鑣了，……根本就沒有什麼文化上的『東亞』」。¹⁴以及

¹¹ 謝遐齡，〈中国・西洋哲学融合の可能性についての探求〉，收入後藤康男編著，《東洋思想と新しい世紀》（東京：有斐閣，1999）。卞崇道，《融合與共生：東亞視域中的日本哲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¹² 拙稿，〈日本幕末思想家高杉晉作的中國觀：兼論「明倫館」與「松下村塾」之思想教育〉，收入高明士主編，《東亞文化圈的形成與發展：儒家思想篇》（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4），頁 267-322。

¹³ 拙稿，〈王韜與日本維新人物之思想比較〉，《臺大文史哲學報》64 期（2006），頁 131-171；〈王韜と近代日本：研究史の考察から〉，收入陶德民、藤田高夫編，《近代日中關係人物史研究の新しい地平》（東京：雄松堂，2008），頁 87-115。

¹⁴ 葛兆光，〈地雖近而心漸遠——十七世紀中葉以後的中國、朝鮮和日本〉，《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 3 卷第 1 期（總第 5 期）（2006），頁 291。

姜在彥《西洋と朝鮮：その異文化格闘の歴史》一書¹⁵所提示「朝日之間近代化的岐路」等問題意識之後，進而聯想到，必須將當時代東亞知識人思考近代性的異同問題納入研究範疇，重新以東亞為視野，探討「近代性」的問題，這是編輯本書的動機。

本書主要針對十九世紀以降，資本主義思潮急速在東亞社會擴散的過程中，東亞知識人是如何思考、因應所共生的「近代性」經驗，如何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之下扮演不同的角色，對「近代性」又有何異同的主張。輯錄了臺灣、大陸、韓國學者撰寫的七篇相關主體論文，思考西洋文明所帶給東亞知識人對近代性的「衝突」以及感受到「挫折」的原因，目的在於探求如何促進東西文化的相互理解、共存融合的方法。內容涵蓋以下幾項課題：

- (一)、日本與韓國面對「近代性」的不同背景圖像；
- (二)、從共同文本的不同翻譯看東亞對「近代性」的反應；
- (三)、漢學、蘭學與日本近代化之關聯性；(四)、從韓國看近代日本國家主義的形成；(五)、中日近代知識人對歷史觀念的變化；(六)、以「西」釋「中」的歷史脈絡與「近代性」的關聯；(七)、近代中日知識人對美國文明認知的異同。

¹⁵ 姜在彥，《西洋と朝鮮：その異文化格闘の歴史》（東京：文藝春秋，1994），頁 271-285。

(一)、日本與韓國面對「近代性」的不同背景 圖像

日本自古以來攝取中國文化的媒介者即是朝鮮，但十七世紀中葉明朝滅亡之後，日本與朝鮮均以不同方式脫離以中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而逐步形成自我中心意識。十八世紀之後，日本對外國人（異國人）通稱為「唐人」，開始對自己的文化產生了信心，而形成了「去夷存華」，認為自己才是代表儒家世界中心，所謂「日本型華夷意識」的概念。德川中期的「國學」大家本居宣長（1730-1801）所提出「物之哀」（もののあわれ）之文學論，引發了日本社會思考排除中國的要素，而建構自我世界觀的可能性。依照井上厚史的解釋，本居宣長是將「聖人之國」的中國還原成「異國」（他者），目的在脫離「他者」的優越性，而建構日本的自我形象。¹⁶「國學」的意識形態，從德川幕末延伸到近代，改變了日本知識人的對外觀念，卻也引發之後的「征韓論」，破壞了日韓之間的友好關係。相對於「日本型華夷意識」，朝鮮則產生了「朝鮮中華主義」，認為朝鮮才是儒家道德唯一的後繼者，但又不以天下自居。¹⁷十九

¹⁶ 井上厚史，〈日韓關係における蔑視觀の変容〉，收入河宇鳳著，井上厚史譯，《朝鮮実学者の見た近世日本》（東京：ペリカン社，2001），頁395-396。

¹⁷ 「朝鮮中華主義」的概念，由林榮澤於2006年提出。詳請參閱劉青峰、金觀濤，〈19世紀中日韓的天下觀及甲午戰爭的爆發〉，《思想》第3輯，「天下、東亞、台灣」專號（臺北：聯經出版，2006），頁115。

世紀以前，日本人的朝鮮觀從尊敬到蔑視，其內涵是多元，過程是複雜的。羅麗馨的〈十九世紀以前日本人的朝鮮觀〉一文，從日本民族優越意識的核心思想，即華夷思想、領域觀念、神國思想及「國王」與「大君」稱號所反映的朝鮮觀等諸多層面，探究十九世紀之前，日朝兩國知識人與庶民的互動關係。論文的內容讓我們瞭解到兩國不同的「自我中心論」引起東亞世界關係複雜化的諸多省思，也提供我們思考近代日本與韓國在面對西洋文明衝擊的過程中，產生了哪些不同的背景圖像。

（二）、從共同文本的不同翻譯看東亞對 「近代性」的反應

梁台根以中日韓三國的共同文本（common text）*Political Economy* 一書之不同譯本的內容作比較研究，嘗試探討西方知識的引進、傳播和吸收，以及東亞內部複雜的知識傳播之互動脈絡，以釐清東亞各國在知識轉型過程中所呈現的歷史意義。梁台根以韓國學者的角度，作跨國性的區域研究，一反過去普遍認為因日本文明開化、明治維新之成功，使日本成為引介西方學說的東亞區域中心之論述，跳脫西方至東亞的單線傳授視角，針對東亞各國的啟蒙運動家在引進西學時，其選擇學說、決定翻譯文本等的觀點，進行多面向的探討；希望透過究明區域內部的複雜互動，以及與西方原典和翻譯內容的異同與雙向互動，清

楚釐清各國思想獨立之主體性，進一步瞭解西方知識傳播過程中，中日韓之間的關聯性及其特殊意義。

梁台根首先指出，《Political Economy》一書經福澤諭吉於1868年簡譯為《西洋事情·外編》，介紹給明治知識人，主要目的在於傳遞歐美政治、經濟相關資訊，剖析本書的東傳不但影響日本文明開化思想的傳播，也促成東亞新秩序的誕生。爾後，《Political Economy》被完整翻譯成《佐治芻言》，流傳於中國，述及梁啟超於其《讀西學書法》（1896）中，評論《佐治芻言》為「論政治最通之書」，探討此書對梁啟超認識歐美政治運作的影響，並舉例說明《佐治芻言》的翻譯及其詮釋的基礎，闡釋引起當時中國思想界共鳴之原因。梁台根同時論證梁啟超並非全面接受日本思想影響，認為其受文明論述影響是多元的，尤其強調中國內部在西方思想的翻譯和傳播成果，突顯出中國思想界不容忽視的自主性。《Political Economy》接著由俞吉濬（1856-1914）首次以韓文與漢字混用文體的形式，於1895年出版成《西遊見聞》。俞吉濬將《西洋事情》的部分篇章重新編排，並增補部分個人留學經歷和蒐得的資料，因此體例不一，內容也不盡相同。《西遊見聞》是韓國首部論及「文明開化」和社會競爭的書籍，同時評述本書雖受到福澤諭吉的影響，然透過對其增補內容的解析，可印證其間反映著俞吉濬個人思想的獨立自主性。

著眼於三本譯書的詞彙、體例及內容異同的比較研究，尤其就日本的《西洋事情·外編》影響韓國《西遊見

聞》的編纂及其自主性的關係進行分析。梁台根指出，同一文本在翻譯或編撰過程中，因各國的實情，可以發揮相當大的詮釋調整和思想拓展，反映各國的思想獨立和自主性，突顯出這三本書在中日韓三國汲納文明史觀和自由思想的歷程上之重要性。

本文從韓國近現代經歷的歷史環境和社會性質，強調其文化傳承異於中國及同受日本殖民統治的臺灣。提示東亞各國面對「近代性」的不同反應，為研究東亞或亞太地區的近代化，提供了絕佳的討論空間。

（三）、漢學、蘭學與日本近代化之關聯性

傳統與近現代的文明何者為重？中日韓近代史學界已經有諸多不同角度的論述。就明治時代啟蒙思想的形成而言，近代日本知識人在思考「近代性」的過程中，已有一段很長的前置期，例如「蘭學」在日本社會的發展與他的近代化息息相關。又如「後期水戶學」的發展，醞釀了尊王攘夷論的成立，佐久間象山所拋出的「東洋道德·西洋藝術」論，帶給德川幕末的知識人極大的迴響。

日本近代科學之基礎，肇始於德川時代的「蘭學」，以荷蘭語為媒介，藉由翻譯典籍，將西洋醫學、世界地理知識及產業技術等東傳，影響及於日本學術、文化及科技之發展。德川幕末諸多知識人，更透過英、法、德、俄等多種語言，廣泛且直接吸收「蘭學」、「洋學」知識，並加以

運用，加速了日本文明開化的腳步。

十八世紀後期，歐洲世界之產業革命及市民革命浪潮湧現，導致西歐勢力東漸，殖民擴張延伸至東亞；歐美貿易商船的逼近，迫使東亞世界的秩序產生了變化。德川中期的日本社會浮現內憂外患之景象，十九世紀中葉以降，中英鴉片戰爭及培里叩關日本之後，給幕府之國防、外交帶來莫大的挑戰。地方諸藩的知識人在感受西洋勢力入侵東亞之威脅後，深刻意識到瞭解世界的重要性。幕府為了鞏固政權，修改與天皇一體化「公武合體制」之政治路線，導致與諸藩間的尊皇攘夷運動對立頻起，幕府老中之間也掀起避戰、主戰的爭論。地方藩侯與知識人針對如何發展對外關係、確立國防體制，有諸多不同的解讀，幕府與諸藩的衝突持續升溫。筆者針對箕作阮甫、塩谷宕陰、佐久間象山三位德川幕末知識人之思想變遷，探討他們對漢學、蘭學與日本近代化之關聯性。

(四)、從韓國看近代日本國家主義的形成

在 21 世紀全球化的潮流中，位處東北亞的日本與韓國，為了本國的利益，紛紛與美國及歐盟建構一個新的區域共同體，但是日韓之間仍然存在著諸多殖民與被殖民的歷史包袱問題，而難以解決。在人文社會史的研究領域中，不乏將殖民主義與「近代性」視為表裡一體的關係，用來檢視近代性所延伸的各種面向問題的論文。韓國學者金